

# 如何让企业在意在公众中的口碑

当人们在屡屡指责一些企业只知道赚钱，不顾及其它的时候，我们更有必要拿出明确的、扎实的标准说话。更深的一步，是我们应在制度层面、惩治力度上有所约束，让那些无视社会责任、口碑欠佳的企业付出必要的代价，从而让它们“长记性”。

将近日两件引起公众质疑的事放在一起分析，很有意思——一是中移动等运营商为一些从事黄色淫秽内容的企业违规提供手机上网接入服务，给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带来危害；二是一些石油企业在南方一些省市的加油站接连发生气荒，影响了部分企业生产及居民生活。

上述新闻有这样共同特点：其一，当事企业都把追求商业利益放在了企业发展的首要位置，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商业行为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其二，这些企业的行为受到社会舆论质疑后，都在第一时间“撇清”自己的责任，不是说“信息提供者违规经营”，就是说“社会需求激增”，再不就是“遵循市场规律”，云云。这些理由受到社会的一片质疑和批评。缘何如此？重要原因之一，这些企业在想赚钱的同时，没有正确认识企业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问题。

从后续报道看，这些企业在社会压力下，开始主动或者按照政府的要求修正自身的行为，如中移动等运营商主动关闭了一些违规经营者的接入服务，石油巨头也已经按照国家发改委的要求，努力增加天然气供应和调整行业用气比例。这些补救措施基本上得到了社会的肯定。

企业如何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这是现代社会中企业经营必须平衡把握的问题。一旦失衡，就可能产生不利于企业自身也不利于社会和谐的后果。目前社会上存在的一些矛盾，与

一些行业及企业忽视企业社会责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无论是公众，还是企业界内，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企业经营并不是“只要不违法”就万事大吉的。

但是，企业社会责任应该包含哪些内容，业界及公众并不是十分清楚，很多情况下，人们只停留于一般性的指责，缺乏相应的原则或刚性的条款。可喜的是，一些地方正在尝试制定相关标准。如本报11月25日报道的“杭州首次出台社会责任建设10项标准”即是一例。

这样的工作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即当人们在屡屡指责一些企业只知道赚钱，不顾及其它的时候，我们更有必要拿出明确的、扎实的标准说话，即让更多企业在行事之前能明白，哪些事是可能被公众“戳脊梁骨”的，是可能招骂的，是做不得的。当然，更进一步，是应在制度层面、惩治力度上有所约束，让那些无视社会责任、口碑欠佳的企业付出必要的代价，从而让它们“长记性”——如果没有后者，再详细的标准，人家也可能置之不理。

追求商业利益是资本的本性，但过度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社会责任的承担，这样的企业注定走不远，长不大，做不强。

企业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体，其行为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底线，那就是实现追求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的平衡。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大型行业，其经营者更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 ——“麻烦”出在椅子上

近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院开庭审理个旧市原建设局局长、规划局局长、市政府副调研员吴会祥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据《都市时报》报道，吴在法庭上语出惊人：“钱不是送给我的，是送给局长这个位子的。”

说的倒是大实话。只是吴某何以这样说？是在自我反省和悔过，还是为了开脱责任求得法庭的宽大呢？如果是前者，还算是个明白人，如果是后者，未免就有些异想天开了。

## 图说

□徐进/画



# 坚守昆仑二十年 为民奉献真品质

——记新疆阿克陶县库斯拉甫乡党委书记师延林

拉着他们的手说：“辛苦了！”

克孜勒陶乡地处帕米尔深山，照明靠点灯，吃水靠人挑。作为乡党委书记的师延林带领党委一班人调查研究，积极争取上级有关单位的支持帮助，克孜勒陶乡面貌焕然一新，全乡有7个村960户5700人用上了电，300多户2000多人用上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山里的农牧民告别了靠点油灯、到河里挑水的日子。广播电视也走入深山峡谷进了百姓家，每个村都安装了太阳能、卫星电话，结束了深山与世隔绝的历史。

阿克陶县的库斯拉甫乡地处帕米尔高原深山处，距离县城300多公里，自然条件十分

## 高法公布审理拐卖儿童案件情况

# 拐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案件明显增多

本报北京11月26日电（记者张伟杰）记者从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10月，全国法院共审结拐卖儿童犯罪案件1107件，同比增长11.25%。值得注意的是，拐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案件明显增多。胡明华拐卖儿童案就是拐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典型案例，该案的被拐卖儿

童绝大多数都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

据介绍，近年来一些地方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猖獗，并呈发展蔓延之势，犯罪团伙组织日趋严密，犯罪手段更加隐蔽、狡猾、残忍，盗抢儿童案件突出，因拐卖儿童引起的伤害、杀人、强奸等恶性案件逐年增多，危害日益严重。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王少南说：

刘有贵曾经是江苏省南京市江浦县的（现浦口区）副县长、六合区的副区长，几年前他辞职下海，不到一年，就成为坐拥1514亩住宅用地的“地主”；几年后，便成为身价过亿的大老板——据11月25日《法制日报》报道，近日，他因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被判刑。

刘有贵35岁担任副县长，在仕途上可谓“顺风顺水”，他辞官从商的原因，无非是其长期分管建设、土地工作，“人脉关系当然远非一般房地产商可比”。事实证明，他没有看错自己的“人脉”价值。

“人脉”能够带来财富，可以办成通过正常途径很难办成的事。比如，出让土地，地方政府必须要有规划要点，而浦口区（原江浦县）有关部门硬是根据刘的需要，在短时间内办好了1514亩地的规划要点，并把用地

性质确定为建设别墅的一类居住用地。

正是在“有关部门”、“老朋友”、“老部下”这些“人脉”的掩护下，刘有贵才得以“空手套白狼”，在短时间内暴富。而所有这些“帮忙”都是权力的畸形运作，无一例外

见不得光，经不起晒，摆不上台面。

所谓的官场“人脉”，不过是权力不见光运作的美丽外衣，钻的是政策和法律的空隙，折射出的是监管的旁落。虽然刘有贵只是个极端的例子，但谁又能否认，利用

## 新闻观察

□燕农

# 全区投票：民意终于说服了公权

据11月25日《南方日报》报道，针对备受关注的广州市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番禺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和区政协日前分别召开会议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五条处理措施，其中包括：聘请专家作全区的区域规划，垃圾焚烧电厂选址拟进行重新审视和论证；建立科学、民主的政府决策机制，不排除进行全区群众投票。

从“没有比这更适合的地方了”“推进垃圾焚烧发电坚定不移”，到“重新审视和论证”、“不排除进行全区群众投票”，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终于从政府部门一意孤行，回到了听取民意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是一个艰难的转折，最终让人们看到了公权被民意说服。

说其艰难，一方面从2003年起，番禺区就

开始着手垃圾焚烧厂的选址，并会同市、区两级国土、规划等部门经历3年多的调研和选址论证，于2006年初步确定了目前的选址——换言之，当地政府在这个项目的选址上已经酝酿很久，除了征求民意之外的前期工作几乎全部到位。而既往经验一般是，此时再让公权改弦更张，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另一方面，在各地公共事务管理中，到

立场上。

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公权姿态和形象。我们的政府有责任保障公民的权益。在城市公共事务管理中，市民不仅有知情权和监督权，还应该有参与权。而政府的决策权应该建立在市民的这些权利之上。理论逻辑上，政府部门所拥有的公权，是应该与民意合拍共振，达成一体。

近7年来，为了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当地政府部门会商、调研、论证、招商，付出了巨大的行政成本；为接待数百市民上访，有关部门消耗了不少社会资源。因此，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既有教训又有经验。

核心的一点，公权在公共事务上只是一个执行者，需要问计于民，需要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并且不排除“全区投票”的尝试。

## 大众话题

□黄哲雯

# 切忌“一竿子打落一船人”

据11月25日《北京晨报》报道，新发布的公务员健康白皮书称，公务员患脂肪肝、高血压、高血糖和血脂异常的比例，高于普通脑力劳动者；领导干部98%体检异常；超四成公职人员超重或肥胖，近半公务员每日感到疲惫。该白皮书基于中国医师协会、人民网等机构的联合调查，涉及全国31个省、区的589个城

市。

尽管此报告堪称权威，然而，同此前一些

地方相继发布完类似新闻的命运一样，不少

网友非但没有对公务员的亚健康状态表示理

解和同情，反倒认为致病原因与为民操劳没

多大关系。

其实，这事得分两说。像肥胖、高血糖、

高脂肪这类所谓的“富贵病”或“馋嘴病”，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与多吃少动、工作和生

活比较安逸有关，比如，平日里吃喝多了，

公车坐多了。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

“官场病”。

但是，我们切忌“一竿子打落一船人”。我

们不能因为某些地方公务员的上班时间缩水

成了“惯例”，或者上班时间聊、打牌、下棋成

风，便就此否认公务员队伍中大多数人是兢

兢业业地在工作，多种压力使得他们每天都

感到身心疲惫这一事实。

当然，在如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亚健

康”是啥概念的情况下，在农民工等弱势群体

的身体健康状况并不乐观，一些从事高、危、

险工种的人职业病频发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公务员这一岗位令众多艳羡和追捧的情况下，媒体把关注的目光放在公务员的亚健康状态上，难免会引起一些公众心理上的不适，招致牢骚和“拍砖”也是自然的。因而在这一

点上，媒体有必要适可而止，把关注对象的视

野放得更宽广些。

比如，能不能多发布一些有关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健康状况的调查报告，看看他们都

被一些什么样的病困扰着，看看如何来改变

他们的生存条件、加强对他们的劳动保护，如

何尽快地让他们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障。相

对来说，这样的调查或许更能体现社会责任，

对社会更有益些。

## 邓建军



新华社南京11月26日电（记者林凯）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年一代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工人如何在平凡的岗位上造就辉煌的业绩？面对这些人生课题，技术工人邓建军作出了响亮的回答。

邓建军，1969年生，江苏常州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他冲击纺织机械领域世界难题的技术创新之举，被外国专家叹服为“中国功夫”。这位来自华罗庚故里——常州金坛市的中专毕业生，在工作的21年里，成为新世纪全国首批七个“能工巧匠”之一、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十佳标兵”。持之以恒地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造就了今天的邓建军。

1988年的邓建军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常州黑牡丹公司做电工。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刚进厂不久的一次工作经历竟然是这样的苦涩。

一天夜里，邓建军接到了车间打来的电话，一台由他负责保养维修的机器出了故障。接到电话后，邓建军立即赶到厂房，经过几个小时的检测，始终束手无策。在工友们质疑的眼神中，邓建军一路小跑，找来了一位师傅。只用了10几分钟，老师傅就修好了机器。事后有人悄悄地告诉邓建军，因为维修耽误了过多的时间，厂里一下子就损失了好几千元。

起步阶段一连串的困惑和挫折，让邓建军陷入沉思：有技术但底气不足，如果一名职工没有能力为企业攻坚克难，又怎能为企业的发展出力呢？

重压之下，邓建军给自己订下了强制学习计划，每晚必须看一个半小时的技术书籍和有关资料。几年下来，他读了200多册专业书籍，在获得大专学历后继续攻读本科专业。

后来，他又用惊人的毅力跨越了英语和德语的障碍。终于，厂里1000多台（套）机器设备的“脾气”，他全部摸清；可能出现的机电故障和对策，他烂熟于心。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面对国际纺织市场的冲击，我国传统的纺织业失去了优势。邓建军所在的黑牡丹公司从国外引进了一批剑杆织机，准备转产国际上最优质的牛仔布。

面对数十台缺乏图纸，各种电器线路犹如一团乱麻的进口设备，数以万计的芝麻粒大小的金属接点如同一座座沉重的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这些机器，闲置一天就会有数万元的损失。邓建军一咬牙，从最基本的制图做起，每天蹲在机器边14个小时以上。1台、10台、50台，面对成千上万的电子元件和细若游丝的控制电路，他拿着放大镜，理清一个，划上一笔。眼睛累得看不清了，就用湿毛巾捂上一会儿。终于，机器被驯服了。看着这些“起死回生”的机器，工友们佩服地说，邓工了不起。这次维护改造的成功，使得过去见不闻名见经传的“黑牡丹”一跃迈上了世界牛仔布生产的大舞台。

1996年，公司从比利时进口了一批喷气织机。这些机械最关键的部分是一个如同肥皂盒大小的传感器，由于这是纺织机器的核心技术，在安装时外商拒绝提供这方面的技术资料。于是，这些公司可以为企业创造更大效益的先进设备，却成了“久治不愈的病人”。

邓建军决定立刻动手“医治”这批设备。经过反复测算，邓建军发现，原来是线路板中一个小零件会因为机械的高速震动而损坏。这样一个极不起眼的零件，生产设备的比利时公司竟向中国企业开出了1万元的天价。而在国内的市场上，这些器件有的只要1分钱就能非常容易地买到。

参加工作21年来，邓建军先后参与了400多个技术改造项目，独立完成145项，其中仅染浆联合机——车速改造技术一项就创造经济效益3000多万元。

1999年，公司将邓建军所在的电子组改名为以他名字命名的科研组。在邓建军的带领下，这个团队相继攻克了牛仔布的预缩率等世界性难题，使企业有效应用了世界牛仔布18项最新技术中的15项。

**人民英雄**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

拉着手的话：“辛苦了！”

克孜勒陶乡地处帕米尔深山，照明靠点灯，吃水靠人挑。作为乡党委书记的师延林带领党委一班人调查研究，积极争取上级有关单位的支持帮助，克孜勒陶乡面貌焕然一新，全乡有7个村960户5700人用上了电，300多户2000多人用上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山里的农牧民告别了靠点油灯、到河里挑水的日子。广播电视也走入深山峡谷进了百姓家，每个村都安装了太阳能、卫星电话，结束了深山与世隔绝的历史。

阿克陶县的库斯拉甫乡地处帕米尔高原深山处，距离县城300多公里，自然条件十分

恶劣。

组织上考虑师延林在山区工作了17年，

精通语言，熟悉情况，想派他到库斯拉甫乡工

作。由于担心他会有想法，就专门安排人和师

延林先谈。师延林没有犹豫也没有豪言壮

语，痛快地答应了。

库斯拉甫乡是阿克陶县最贫穷的乡之一，

年人均收入仅有900多元，师延林把提高农牧民

收入、改善农牧民生活条件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他积极推广小麦、玉米良种，增加种植业收入。

四处奔走联系，每年都组织农牧民外出务工，不

到3年，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